

论实事求是的实践障碍

——以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奋斗历史为叙事主线

张 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 210093)

摘 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与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艰苦奋斗历史紧密相联。党九十余年奋斗历史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实事求是障碍论呈现不同表现形式。一是“理论裁剪现实”,即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维方式限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障碍”;二是经验框正现实、理想遮蔽理性,即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的束缚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障碍”;三是思想解放的逻辑冲突,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张力关系的部分失调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实事求是的主要“障碍”。必须牢牢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不动摇,这既是对我党九十余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要求。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障碍;中国共产党历史;叙事主线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01-05

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华。然而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历史表明:我们党在历史上犯下的很多严重的错误都是因为脱离了实事求是,每次总结错误、取得成功经验也都是源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可以说,实事求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与发展有着内在的逻辑同构性。那么,厘清坚持实事求是的障碍,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与现实问题。本文拟从中国共产党九十余年发展历史出发,内在寻求解决阻碍实事求是的症结所在。

一、“理论裁剪现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思维方式限制

教条主义将经典作家的理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切从教条出发而不考虑客观变化的实际情况。本本主义亦是如此,它坚持一切从本本出发,是教条主义的“孪生兄弟”。将经典作家理论视为不可侵犯的教条,实际上是封闭了理论发展的空间;不顾具体实际情况照搬照抄经典作家的理论,不但不利于理论指导实践,反而会危害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创立其理论之初就曾

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不是绝对真理可以照搬照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

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对于如何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则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是促使当时中国先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动因,正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经过俄国这一中介实现的。当然,这需要辩证地加以对待:一方面俄国的中介为中国人民及时地找到指引革命前进的旗帜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主要是以俄国人为榜样,“走俄国人的路”也成了当时的历史必然选择,这为后来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埋下了伏笔。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由于过分崇拜教条权威,在运用理论过程中往往导致用理论框正现实,使实践服从理论的倾向。建党伊始,由于在思想理论准备上较为仓促——虽然建党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在中国翻译并传播马克思主义,但事实上,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仍较为薄弱,党主要

收稿日期:2012-08-3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0JJ710012);江苏省教育厅重点项目(2010ZDIXM014)
作者简介:张明(1987—),男,江苏溧水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

领导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加之国内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到革命斗争实践中去,使得进一步充实完善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可能性。在此情况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在他们看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是直接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理论本身产生了盲目崇拜的心理,以为上了书的都是绝对真理,因此开口闭口都要“拿本本来”,党内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于不懂得理论理想、现实条件与策略手段的关系,固守理论理想,不研究现实条件,把理想当作‘完美不变’的目标,把书本上的理论、方法当作包医百病的药方。”^[3]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的出现,一方面表明党的主要领导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马克思主义是方法而不是教条,另一方面是党在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和缺少马克思主义修养从而导致自信不足的真实写照。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缺乏必要的斗争经验加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的不够,从而导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唯书本马首是瞻。

可以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教条主义与反教条主义斗争的历史。毛泽东深刻明白,如果不肃清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对革命的影响,如果不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本本出发、照搬照抄别国经验,中国革命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就不断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展开激烈批判,他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宣扬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战斗檄文,并且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如果说《反对本本主义》主要是针对陈独秀(被迫听命于共产国际)、瞿秋白(主动听命于共产国际)等‘左’右倾错误,那么,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主要针对的是王明忽‘左’忽右的教条主义。”^[4]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5]¹¹¹⁻¹¹²反对本本主义的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口号可谓是振聋发聩。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对教条主义进行了进一步批判。他明确指出,不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视为指导实践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与本国

的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6]⁵³⁴在1941年写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展开了更加系统、深刻的批判。他将教条主义上升到主观主义高度,并对其进行了哲学的分析与批判,认为主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态度,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表现,“要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7]⁸⁰¹至此,实事求是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不断取得胜利。

二、经验框正现实、理想遮蔽理性： 经验主义、理想主义的束缚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是不断践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但遗憾的是,由于主客观原因的限制,他在晚年却违背了其一向提倡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陷入主观主义泥潭并犯下了严重错误。我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错误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以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的。^[8]建国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顺利完成,党和国家的实践主题也发生了相应的置换,即由革命转移到建设上来。因此,在建国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可惜的是,这些实事求是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延续和发扬。

毛泽东晚年违背实事求是的表现之一就是经验主义泛滥,不是用经验指导实践,而是用经验框正现实。科学对待经验的态度是,必须对经验进行辩证的全面的分析。经验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历史的产物,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伸缩性。也就是说,随着主体的变更、历史条件的变化,相同的做法却不一定能够产生相同的结果。经验具有双重性:它有时对于探索新的实践活动具有积极意义,有时又会成为一种阻力。“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会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8]因此,经验虽然对实践活动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但这种“指导”只能是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指导,即通过与具体实际情况的结合,结合以往经验形成指导实践活动的方式和途径。因此,经验指导实践,是实践与旧经验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经验的过程的有机统一。对于经验的指导,我党幼年在对待“十月革命”经验问题上曾犯下了严重错误。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活动

的经验总结,因此,只需将其搬到中国,便能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活动取得胜利,但照搬照抄“十月革命”经验却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原因在于它是俄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具体实际的产物,而中国革命必须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对这种经验主义给予了最为激烈的批判,但是其晚年却走向了经验主义的泥潭。在我们看来,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胜利,使得毛泽东开始自满,认为不管什么任务、什么工作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都能够顺利完成;二是对革命战争中所形成的经验开始崇拜,认为只要按照这些经验(在实践中都一次次证明能够取得成功)办事,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诸如在关于是否恢复革命战争年代供给制问题上,他曾说过:“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了呢?”^[9]⁸³³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毛泽东开始使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指导经济建设活动,诸如强调人的意志作用,无限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搞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群众大炼钢、组织群众会战),等等。毛泽东晚年经验主义失误的实质是没有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满足于用过去的经验即过去的“结合”指导现在的实践活动。因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是一劳永逸,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不断结合的过程。^[8]

毛泽东晚年违背实事求是的表现之二是理想主义支配实践,理想遮蔽理性。毋庸置疑,毛泽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理想主义大师。不论是早年锻造“新民”、建立“新村”的理想,抑或是延安时期构建军事共同体的理想,还是晚年建立人民公社的理想,都无可辩白地表明:理想主义是支配毛泽东一生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最杰出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然而也正是毛泽东保持了革命的理想主义,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许多理想主义革命家变成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毛泽东依然坚持他的乌托邦式的革命理想。”^[10]²⁸⁴毛泽东晚年失误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张力关系被打破,理想主义凌驾于现实主义之上,现实主义失去对理想主义的制衡。理想主义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一切以其心中最美的理想为转移。具体而言,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平正义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毛泽东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也是其心中最高的理想。但是,在完成“三大改造”后,“建立社会主义”与“建成社会主义”之间的遥远距离,理

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使得毛泽东内心急切希望早日实现美好理想蓝图,理想主义也因此凌驾于现实主义之上成为支配毛泽东行动的法则。“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理想主义支配下,由于只看见理想而不考虑现实,使得毛泽东头脑开始发热,急躁冒进的情绪开始出现。为了将理想立即转换为现实,“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大跃进”是进入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人民公社是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形式。“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完全从毛泽东的主观理想出发,不顾客观历史条件、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限制,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当党内部分领导人开始反思这些错误,主张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之时,毛泽东将其视为对其理想的否定,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毛、刘之间分歧和悲剧性结果,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言是出于权力斗争,而是理想、主义之争为主,伴随着权力之争。^[11]不可否认,毛泽东晚年许多理想都具有深远的价值,但是其关键的弊端就是理想超越了现实发展的具体实际、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最终只能是陷入乌托邦式的幻想。列宁曾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乌托邦主义是对理想主义的惩罚。

三、思想解放的逻辑冲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张力关系的部分失调

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悲剧就在于违背了其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原则,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科学总结建国后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教训,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针对“文革”之后出现的“两个凡是”的思想(究其本质而言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翻版,是与实事求是根本上是对立的),邓小平明确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准确完整的理解、运用毛泽东思想。他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2]¹¹⁴在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貌为之一新。邓小平晚年曾说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我们过去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3]³⁸²邓小平不仅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做出了“突破性”发展。针对毛泽东晚年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以及在“文革”中形成的思想僵化、迷信盛行、保守主义等制约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并从思想路线和认识论角度出发,将其置于与实事求是相等同的高度,认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丰富和拓展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内涵。因为要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将思想从僵化保守和习惯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思想得到解放,才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处理遗留的历史问题,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至此,解放思想成为实事求是的代名词,并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在推动解放思想、宣传解放思想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对解放思想的认识却发生了偏差。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本是紧密联系的有机体,但是有人却人为将其割裂,甚至以解放思想取代实事求是、将解放思想凌驾于实事求是之上。在“胆子要大一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等口号的号召之下,有的人片面理解了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深刻内涵,错误地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比谁的胆子大,就是比谁敢突破常规、标新立异。其实不然,邓小平最初明确关于解放思想的定义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2]279}后来,邓小平对解放思想重新进行了规定,就是我们上面所言及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笔者以为,邓小平的这一变化,丰富了解放思想的内涵,使得解放思想的概念更加科学全面。有助于减少对解放思想的误解、误用。也就是说,从这一规定中可以明显看出,解放思想是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提倡解放思想并不能以牺牲或否定实事求是为代价。

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提出“胆子大一些”是针对特定问题所言的,将解放思想提升到等同于实事求是的高度,最终目的是为了通过思想解放达到重新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次,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并不是对实事求是的否定,两者是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和条件,并且解放思想必须在实事求是的指导之下进行,解放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坚持实事求是。最后,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定义包含多重内涵。解放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这一点包含双重含义:一方面是主观认识滞后与客观现实,诸如毛泽东时代仍然用革命战争中的

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忽视对客观经济建设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研究,使得主观落后于客观。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就必须进行思想解放,使落后的主观认识及时跟上变化发展的客观情况,在这时就必须宣扬“敢闯、敢干”的精神,鼓励创新,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主观认识超出客观实际发展情况,诸如毛泽东时代提出的许多理想并不能说其不具备合理之处,但关键在于其超越了客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所以必须使得主观认识回复到具体情况和客观规律基础之上,这一过程可以视为“拉”的过程。

“胆子大一点”或者“胆子小一点”都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内涵,不能说“胆子大一点”就一定是解放思想,而“胆子小一点”就是保守主义,就阻碍解放思想。胆子的大小不是由主体主观意志所直接决定的,而必须与客观实际情况相符合,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一般说来,当需要摆脱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使主观思想跟上变化发展的实际,则要求人们胆子要大一点,甚至再大一点;而当要求摆脱超越时空的危险冒进的观念时,则要求主体应该冷静清醒,小心谨慎。这两种不同的要求,遵循的都是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科学的解放思想的内涵。”^[14]所以,解放思想不能脱离实事求是的制约而成为脱缰的野马,实事求是宛如套在马脖子上的缰绳,控制着解放思想的力度、方向。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解放思想以不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然而,当下却出现了一种更加错误的倾向,即否定解放思想的前提——实事求是^[16]。有的人认为解放思想就是比谁的胆子大,比谁敢突破常规,认为与实际情况越不符合就越解放思想,打破规律限制甚至消灭客观规律就是解放思想的表现。甚至还出现用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去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情况。上述观点将解放思想视为无党性的口号,甚至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而不断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底线,认为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15]其实质就是借解放思想之名,做推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三位一体”之实。从本质上看,在这种所谓的“解放思想”指导下,既不可能真的做到解放思想,也不可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16]。当下,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因此,必须对上述错误观点加以坚决抵制,深刻地进行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与时代、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2-743.

[2]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何怀远.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经验[J]. 哲学研究,2011(7):3-9.

[4] 徐光寿.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115-120.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 刘林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兼论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历史价值[J]. 湘潭大学学报,2009(5):1-9.

[9] 逢先知,金冲. 毛泽东传(1949-1976):上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 杨炳章. 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M]. 郭伟,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1] 何云峰. 毛泽东: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J]. 社会科学战线,2006(5):6-13.

[1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4] 林源. 究竟什么叫解放思想? ——邓小平: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J]. 南京社会科学,2005(12):1-4.

[15] 侯惠勤. 在解放思想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N]. 中国教育报,2008-06-24.

[16] 张森年. 求真务实: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认识飞跃和科学表述[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5(1):21-25.

· 简讯 ·

河海大学获 11 项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江苏省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结果 2012 年 2 月 10 日公布,河海大学共有 11 项成果获奖。其中沈菊琴课题组的“2007 年太湖蓝藻事件对苏锡常地区社会影响计量研究”、陈阿江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陈继红的“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3 项成果获一等奖,另有 4 项成果获二等奖,4 项成果获三等奖,获奖数量及等级创历史新高,获一等奖数量位居全省高校前列。

“2007 年太湖蓝藻事件对苏锡常地区社会影响计量研究”分析了太湖蓝藻事件对社会影响的机理,通过货币化计量对事件影响社会系统的和谐度进行了测量与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对太湖流域水污染中人的行为和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污染冲突中各方的态度与作为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的治水治污策略作了反思。“治世的至理——先秦儒家‘分’之伦理研究”通过对天人关系理论、人性理论及人群理论的三维解读,阐释了先秦儒家由“分”而“和”的伦理重构思路,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秩序、和谐与文化的内在关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是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

(本刊编辑部 供稿)